

以“有形”过渡到“无形”：中国社区研究史再反思

刘小峰

[摘要] 中国社区学派的突出特色是以“社区”作为具体载体来透视“社会”或“国家”，通过“小地方洞察大社会”的方法论，希冀从“有形村落”认识“无形中国”。研究社区、超越社区，“有形”过渡到“无形”的社区研究路径，既是学术场域的内在传动力所致，又是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和国家情怀使然。中国社区研究可以通过渐进式的三个步骤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逐步认识“无形”中国。文章通过对中国社区研究史的回顾，试图回答社区研究从有形社区到无形国家之间的学术追求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当前学人何以可为，并反思“有形”过渡到“无形”，究竟是“学人宿命”还是科学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 社区研究；方法论；有形村落；中国社会

社区研究或社区分析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实践。中国早期社区研究，受到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田野民族志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帕克(Robert Park)等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共同影响，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见微知著”的“窥透”功能，如“解剖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一样”，以“社区”来透视“社会”或“国家”，因此诚如笔者早前所言，中国社区学派的最突出特色是“小地方洞察大社会”，其旨趣在于以“有形村落”认识“无形中国”^[1]。本文通过对中国社区研究史的回顾，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中国社区研究发展历程中从“有形村落”到“无形中国”的学术追求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新时代语境中，从“有形”社区研究过渡到认识“无形”中国之间的努力，当前学人何以可为？最后，初步反思这“有形”一定要转接到“无形”吗？社区研究既在社区之内又在社区之外，研究“社区”又要超越“社区”，究竟是“学人宿命”还是科学的内在要求。

一、“有形村落”与“无形国家”之间的学术沟通是何以成为可能的

社区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更多地是把“社区”当作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特殊切入点，或者说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主题的一个具体而细微的“场域”，从而更好地理解其他社会问题^[2]。中国社区研究史中，在通过对村落这样的微型社区单位进行调查以透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方面有许多经典研究，如葛学溥的广东“凤凰村”研究，费孝通的“花摇篮”调查和“江村”研究、林耀华的“义序”和“金翼”、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并一度发展为以吴文藻为中心的“燕京社区研究学派”。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对小型的村落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民族志研究，来回答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改革、变迁概貌的大问题。因此，中国社区学派的最鲜明特色是，研究者总自觉或不自觉地期许通过社区研究，在“有形村落”与认识“无形中国”之间构筑起一个至少可以沟通对话的平台。社区研究强调社区之外的大社会、国家联系，企图从“有形村落”过渡到“无形中国”的研究进路，既是学术场域内在继承和创新的学理需要，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和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 2013-01-31

[作者简介] 刘小峰，长江大学法学系助教，邮编：434023。

(一) 学术场域的创新和理论追求

中国的社区研究直接受惠于社会学先驱人物吴文藻先生对本土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请进来”和“送出去”的指导方针^{[3]99}。吴文藻认为,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仍是“一种静态的描写”,读者对于其间人民的社区生活和实际活动,“仍未获得十分亲切的印象”^{[4]454}。因此,社区“研究”是相对社会“调查”而发展起来的,并且较之调查要进一步,所谓“研究”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换言之,“社会调查的中心侧重于事实的叙述,社区研究的中心则是侧重事实的解释。一般的社会调查固为中国目前之急需,而精密的社区研究在学术上尤为重要而有价值”^{[4]436}。吴文藻本人曾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提出对“社区”的系统化界定,主张“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5]26}。为了推广“精密”的社区研究方法,吴文藻更多次撰文阐述了社区研究的意义与功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社区研究的计划,如《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1935)、《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1935)、《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1936)、《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1936)等。

总体上看,吴文藻时期中国的社区研究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在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共同影响下,强调功能主义结构整体论视角下的微观村庄共同体的社会生活研究;二是怀有通过村落层面来探讨中国社会问题、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三是多采取田野民族志作业方法,全景式地“深描”村落社会。然而,早期本土社区研究成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时期,他们事实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更大的学术雄心,其作品出版最常见的命名方式便是:主标题+副标题,其中一个研究的具体个案内容,另外一个则体现了研究者更宏大的抱负,至少是概括的方向^{[6]53}。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理解具体社区研究对于认识总体民族社会的价值问题。用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江村经济》所作序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可以)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7]。它同时意味着,中国早前社区研究常通过亲密的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加以考察,旨在从特殊中提炼一般、从微观反照宏观的学术情结。换言之,中国早期的小地方微型社区研究,通常研究的对象就是某个具体个案(或多个案如“云南三村”),但个案研究的结论总有一个拓展(或再利用)的问题,或是重新检视个案在更宏大时空范围内如民族国家、全球现代性层面的理论意义问题。

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学术场域的自我反思对话中,尤其是中西社会人类学界费孝通与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埃蒙德·利奇(Edmund Leach)、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教授等围绕“汉人社区研究”和“微型社会学”、“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对话^①后,中国社区研究学理上出现了三种新的研究取向,这既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继承,又是新时期社区研究的自我创新。但三种趋向究其本质还是在希冀能通过“有形社区”研究更好地获得打通认识“无形中国”的鸿沟的钥匙。

第一,研究有形社区、超越有形社区,关注社区之外的大历史与国家、社会力量。转型中国语境中,中国社区研究者的任何私人领域的民族志叙事都自觉地与民族国家的结构大转型相关联,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前者是对后者的回应。这一脉络下的研究成果颇多,代表性的有王铭铭的“闽台三村”和“溪村史”研究,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董磊明的“宋村”,阎云翔的“下岬村”,黄树明的“林

① 此处曾被许多文献提及,因篇幅所限,不予详述。

村”研究等等。这也就是要求中国社区研究者关注研究单位之外的历史和空间,要有“从内看外”和“从外看内”的双向学术思维。

第二,进行多社区的区域社会比较调查,把区域比较研究看作拓展的社区研究,以“中国经验”为本位,希冀认识、理解无形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概貌。这方面华中乡村治理研究学派的徐勇、贺雪峰、陈柏峰等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其中,贺雪峰甚至认为个案扩展与区域比较是农村社会政策发展研究的基本进路,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不同侧面描画出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的整体性图像^[8]。

第三,社区研究的理论视角更为丰富,如“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实践结构论”(郑杭生)、“过程—事件”分析(孙立平)、“结构—制度”分析(张静)、“关系—事件”分析(李猛)等。此外社区研究的问题也颇为复杂化、多样化,如社区生态、社区维权、社区改造、社区生活、社区治理等,相关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知识视野,为我们重新发现、认识、理解“无形中国”展示了许多内涵丰富、质感饱满的地方风貌和多元化面向。

(二) 重建社会的忧国忧民意识

其实,对于中国学人而言,强调社区研究对社区之外大历史、国家与社会的沟通,并不单是为了迎合学术场域的内在规则,有时(甚至更多的时候)还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重建社会”的国家情怀。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之所以提出了有别于当时“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方法论,也即社区研究方法,即是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工具的。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政治动乱,中国社会经济凋敝、民生贫困问题尤为严重,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如费孝通、晏阳初、林耀华、杨庆堃等纷纷发起对农村社会的实证调查,试图获得“救亡图存”的良方,“引渡”本土社区研究的实证方法迎合了学者们的这种救世愿望^[9]⁹⁶。1937年,费孝通在论述“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时强调,“社区研究有什么功能?我的回答是在供给—控制社会变迁的实用工具”^[10]。在1939年做“江村”研究时,费孝通于“前言”中道出了学术研究的动力正在于“学以致用”、“志在富民”的忧国忧民思想情怀,“本书将说明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并希望向西方读者展示“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数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11]¹⁵⁻¹⁶。为此,“江村”研究的最终追求是为了探索医治社会动乱的“药方”,揭示中国土地问题变革的实质和提出重建乡村社会生活的根本举措,“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11]²¹³。

在实地田野的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末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时期开始在方法论层面意识并倡导,要认识和理解整个中国“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社区研究不失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然是具体的社区”,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12]。在遭遇了西方社会人类学弗里德曼、利奇等对“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和“汉人社区研究”的对话后,费孝通逐渐加强对社区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并在实践中悟出了社区研究“比较社会学思想”和“要融入理论思考”的方法,并自觉践行应用“类型比较法”,以“个别逐步来接近认识整体”的进路来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类型^[13]。在具体经验策略上,费孝通一是拓展社区数量,通过村落类型学如“云南三村”的方法认识整个乡土社会;二是在层次上,通过向上提升,以小城镇、县域或者区域社会格局为单位比较考察中国结构转型概貌。费孝通晚年“行行重行行”的伟大实地社区研究轨迹拓展到了全国内陆和沿边许多省份、自治区。回顾费孝通学术人生史,无论是多次“江村”重访研究还是“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轨迹,抑或社区调查基础上的许多真知灼见,如“乡村工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小城镇、大问题”理论的提出,无不体现了一个卓越的社区研究者企图以“由点到面”的方式“逐步接近”认识整个中国社会,从而为

改造、服务社会建设谋力献言的愿望,也凸显了一代知识分子为走出社区研究困境做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们后生感叹“志在富民”才是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的主旨,社区研究恰充当了费孝通“走到实地中去”经验研究的有力工具。

社区研究这种“学以致用”的救国富民实用工具的思想情怀,不仅在国家危难之时于费孝通等人身上得以深刻体现,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语境中都得到了中国学人的推崇和自觉践行。如华中乡土派的徐勇、贺雪峰、仝志辉、董磊明等,把足迹深入到第一线田野做社区研究时,时时刻刻具有强烈的农村现实关怀和“三农”问题意识,他们站在理解中国农村、改善民生、以农村为本位的高度,对诸如农村土地制度、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流动关系与农业增收创收问题和农村法制建设与村民自治格局等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以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大语境下为“三农”困境的发展献言献策,推进新乡建运动。

二、以“有形社区”过渡到“无形中国”的可能进路何以可为

回顾社区研究史,我们发现从“有形社区”到“无形中国”的沟通是学术场域自身理论反思和中国学人学术责任感的共同旨趣,它既是科学的内在发展要求,也是研究者的国家意识“宿命”。那么,何以从有形社区认识无形中国,社区研究中国化的可能路径或未来走向是什么?自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试图创立的“实地社区研究”的“社区方位论”后,许多中国学者做了有意义的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孝通倡导的“微型社会学”和“类型比较模式”以及后发展的“比较社会学”^[14-16]思想。晚近的则有,卢晖临总结的走出个案叙述的扩展(延伸)个案法^[17],王铭铭、肖唐镖、项继权等的多点村落社区调查方式,贺雪峰提出的“个案调查与区域比较法”与“村庄类型学”^[18],胡鸿保、左宁的“类型比较与追踪调查策略”^[19],申端峰的农村研究的区域转向“从社区到区域”^[20],以及吴重庆主张把“区域研究看成是扩展的社区研究”^{[21]276},谭同学的以中国经验表述的“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法”^[22],还包括笔者总结的以全局和历史视野观照社区研究未来的可能路径:个案拓展与类型比较以及区域比较与历史比较相结合^[1],等。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碰撞合流的中国化社区研究方法,他们其实都是在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论,都试图追求一种通过“有形社区”来达到认识“无形中国”的学术抱负和社会改造目的。至于他们究竟是聚焦于社区本身(单社区或多社区),或更大的社区单位(城镇、集市、县域),还是把社区研究置于区域社会抑或世界民族国家的宏大框架中进行审视或比较,只是进路的不同而已。其实质都是通过对类似村落这样的地域性具体、微观、有形的社区进行研究,希冀透视中国农村或城市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反观无形的中国社会。因此,此时的“社区”研究尽管可能是研究者在社区内研究,但本质上却并不是在研究某社区^①。

诚然,中国化社区研究方法大都有如费孝通解剖“江村”那样希冀尝试通过小型地域社会来认识整个中国的学术抱负。然而,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地域复杂、民族众多的国家,作为无形、整体的中国社会,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有很大的差异(某些甚至具有偶然性),这就使得任何层面上的村落社区研究都难以反映中国社会的完整性。再者,任何个体或研究机构以及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也都不可能将社会的全部原始面貌一次性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

^① 肖林区分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前者将“社区”本身视为一个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具体的客观对象来研究,后者则将“社区”看作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他理论问题的“透镜”。而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把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合二为一了。参阅文献[2]。

它们展示的仅是细致的、风格迥异的村落民族志或地方性故事。即使多村落比较研究或区域社会比较视野下的个案叙述提供了较为宏观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可能,使我们的社区研究注重更广阔社会的问题意识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客观上它们也只是呈现了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现象丰富多彩的人文类型和各色集群面相。因此,通过有形社区研究来认识无形中国社会,在这里似乎就不可避免遇到一些经验障碍和理论矛盾之处。

那么,社区研究,如何如人们期许的那样能构筑“有形社区”与“无形中国”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及何以可为呢?当前中国社区研究现状和经验告诉我们,要全面整体性地认识把握“无形”的复杂中国社会更好地为重建社会服务,社区研究之路大有可为,但同时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因为时至今日,转型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什么恐怕谁也难以给予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判断、推理、预测,我们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以及转型中国的全局概貌还有许多的不知、迷茫与困惑。值得庆幸的是,当前学界无论是从历时性的角度以传统—现代视域对中国社会的社区调查,还是共时性角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社区研究,抑或不同层面对社区研究方法论的对话与反思,都昭示着中国社区研究未来的美好前景。

本文的观点及下文将论述的是,社区研究这种以“有形村落”来认识“无形国家”的方法论,只能是费孝通所言的“逐步接近”方式,在现实层面不可“一蹴而就”,更不用说是哪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手到擒来”的,它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不断趋进的过程。诚如,“科学不提供终极真理,不提供确定无疑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持续的状态中,它始终存在。”^[23]在社区研究的现实经验层面,我们可以通过渐进式的三个步骤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逐步接近认识“无形”中国的“文化格式”。

第一步,强调从夯实的田野工作中形塑“中国经验”,为进一步的社区比较研究和理论拓展对话做基础性奠基工作。这一步,需要高度着眼于实地研究基础上的微型社会学社区研究,从“有形”的村落挖掘更多“有形”的“中国故事”,重新发现中国非均衡社会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小范围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由于地区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所处条件基本相同,因此通过对一个小范围社区的调查研究,也能反映出相同地域的基本情况。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微型社会学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显著特点^{[6]53}。费孝通坦陈,微型社会学的时空限度并不是否定在限度内它的成就和价值,“以微型研究为‘第一步’可以得到比较结实的基础,从这基础上可以更上一层楼”^{[11]290-291}。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发展微型社会学深度个案研究的价值与理由是不依赖于科学—实证化研究而独立成立的,一些学者拿实证量化的标准,以代表性、普遍性去拷问个案研究,只会对以质性研究为目的的当下社区研究尤其是农村研究带来硬伤^[24]。微型社会学的归纳和演绎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其叙述也许不是为了去证明“树木之需要归依于森林,而是为了说明树木何以成为树木”。或者说,微型社会学的“深描”仅仅是要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典型案例,如吴毅的《小镇喧嚣》。换言之,与其希望分散的、碎片的社区研究直接就带有反映中国的旨趣,还不如展示细腻饱满、风格迥异的中国故事,让读者去领悟其中可能的特殊性及其所蕴涵的一般性意义^{[9]98}。

第二步,通过区域比较与历史比较,以全局视野观照社区之外的大国家、社会联系,中国社区研究者走大国集体学术路线,力求将各种特殊性的、具体的有形社区研究成果归纳综合起来,形成沉淀厚重的学术积累,逐渐接近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要走“集体学术”路径,因为在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庞大、各地情况差异极大,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又极具不均衡性,不

同的研究者采用的理论视角、价值关怀和基本判断的不同,导致即使对同一社会现象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一现象特别是在“农村问题”研究领域颇为常见^①。既然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使社会现象的全部原始面貌呈现出来,概念建构和理论抽象的目的都是去粗取精、化繁为简,那么从不同侧面、角度描述同一社会现象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否则,便如“盲人摸象”一般,往往只见一端而不知全部。这就是说,要认识更深层次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社会,需要众多的扎实的经验资料为基础的社区研究,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形成厚实的学术积累,从中国社区之“物”中发育中国社区之“词”,不断构筑对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整体性认识。

第三步,加强中国社区研究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反思精神。社区研究的“文化自觉”离不开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它是特殊表现和一般性的关系。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指涉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27]。为什么要把中国社区研究的自我反思提高到“文化自觉”的哲学高度?因为中国的社区研究直接脱胎于“西学东渐”思潮和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碰撞之处,在民族国家和全球现代性日益扩张的当下语境中,时代赋予了中国学研究崭新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文化自觉”的语境里,社区研究要重新在全球时空坐标下看到中国社区自身作为一个分离世界,所具有的地方性意义和传承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所应做的贡献。也许,“社区研究要经历一个从强调封闭、独立性到强调与大社会及历史的联系最终在大社会、历史的网络体系中重新发现其特殊性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这一道路既是时代主题所赋予的,也是学科理论反思与创新本身所需要的”^{[3]104},这也决定了从有形社区到最终认识无形中国是一个“路漫漫”但又值得憧憬的夙愿。

三、并未结论的小结 “有形”一定要到“无形”吗

诚然,无论是学术旨归还是国家情怀,中国社区研究大都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论,试图通过研究“有形社区”来认识“无形中国”。然而,我们不免发问,难道社区研究者的最终归处都无一例外地将其本质价值寄托在社区之外?社区研究的意义只有在考虑到其与社区之外的互动联系下才存在?社区研究者关注的是社区的特征,而并非是实体性的社区?这“有形社区”一定要过渡到“无形国家”吗?在中国社区研究史的发展过程中,社区研究由微观走向宏观,由“有形”走向“无形”的演绎、推理方法,无论如何精细、谨慎,除了会受到来自科学实证主义者量化标准的责难,这种“小地方透视大社会”的质化方法总难逃避“武断”之嫌。这里可以参阅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格尔兹等与费孝通“江村”研究为代表的“燕京社区学派”的对话,弗里德曼就毫不忌讳地称其是“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格尔兹在1973年发表“深描”一文,主张在典型的小镇或村庄中可以获知的显然只能是小镇或村庄的生活,即“地方性知识”^[28]。换言之,他们都反对通过有形小社会单位或是小单位的“堆积”,从而作为总体无形社会“缩影”的研究进路。

在2005年由华中科技大学主持的17家高校三农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吴毅等人认为,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个村庄类型,对进行区域比较研究以从整

^① 举例说明,近年来,各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部分学者担心改革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带来管理混乱,但一般不反对改革现有体制。贺雪峰却从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角度旗帜鲜明地反对改革现行城乡二元结构,并认为其是让“中国制造”长期处于优势位置的制度安排。参阅文献[25]和[26]。

体上把握中国农村的学术努力表示不乐观^{[21]276}。因此,部分社区研究者主张社区研究回归人类学的悠久历史传统,把社区作为一个独特而分离的世界,回归社区作为独特场域的特殊个体特质和独立完整性功能。某种意义上,“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被认定为人类普适性的范式之后,又被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论成为中国社区论的实质过程”^{[5]29}。此外,不少中国学学者如王宁,主张个案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个案具有代表性,因为其不是抽样统计样本,弄清楚个案的边界不是个案研究的任务^[29]。由此,社区研究中深度个案得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一类现象的范围有多大?它包含多少类型机制?则是不清楚的。部分学者进一步认为,内在性个案研究(单个社区的研究)可以不必具有概化力,它之所以被研究恰在于其能更好地理解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和独特面向^[30]。换言之,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即作为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其意义就在社区之中,而非社区之外;允许存在一些“社区”研究,其目的仅是通过对“中国故事”的“深描”或对“中国体验”的“叙说”,为人们展示了中国非均衡社会丰富的人文类型和多彩面向,至于其可能性的类型机制和普遍性意义则留给读者们去领悟、评判,或是“身临其境”的想象,这为在新时代语境中反思社区研究的进路提供了另外一个侧面。

综上所述,我们主张,社区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我们不仅要重新检视已有社区研究作品中所呈现的特殊性,还应在更宏大的理论、经验视野中反思其普遍性的意义。今后的社区研究,一方面要一如既往地承袭社区与社区之外大历史即国家、社会联系起来的学术脉络(即“‘作为社会中的社区’研究”),另一方面还应该重新观照社区作为一个独特世界所具有的地方性意义和对多元社会文化案例所具有的特殊性贡献,同时,更应该强调社区研究之于改造中国现实社会应有的作用,这是新时期中国社区研究发展的主题。社区研究者无论是对社区之外的历史、空间向度的追求,还是对自身独特存在的地方性个案叙述逻辑的挽留,抑或强烈地对民族国家现实问题关照的情怀,都似乎暗含着呼吁一种当代社区研究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指涉的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最根本意义上还是一种心智品质,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境遇与社会和历史的境遇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因为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民族国家等宏大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31]1-14}。同时,它还要求研究者意识到“在(我们)对将被解释的内容的陈述之中,我们需要范围更为全面的东西,而它们只能由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知识提供”,甚至“每一门考虑周全的社会科学,都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31]156-158}。

[参考文献]

- [1] 刘小峰. 从“有形村落”到“无形中国”——社区研究方法中国化的可能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2-13
- [2] 肖林. “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 社会学研究, 2011(4): 187
- [3] 崔应令. 回顾、反思与重构: 近百年来中国社区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1)
- [4] 吴文藻. 论社会学中国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5]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6] 刘小峰. 微型社会学的超越路径. 《江村经济》评介. 中国图书评论, 2012(2)
- [7] 马林诺斯基. 江村经济序//费孝通. 江村经济.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0
- [8] 贺雪峰.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问题.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199-208
- [9] 刘朝晖.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民族研究, 2005(3)
- [10] 费孝通. 社会调查自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99
- [11] 费孝通. 江村经济.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16-117

- [13] 费孝通. 人的研究在中国: 缺席的对话//费孝通. 社会调查自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99 - 306
- [14] 费孝通. 云南三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84
- [15] 费孝通. 译者的话//雷蒙德·弗思, 著. 人文类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4
- [16] 包智明. 比较社会学.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5: 7 - 10
- [17] 卢晖临, 李雪. 如何走出个案. 中国社会科学, 2007(1)
- [18] 贺雪峰. 个案调查与区域比较: 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进路.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1)
- [19] 胡鸿保, 左宁. 村落社区的民族志: 类型比较与追踪调查. 思想战线, 2008(6)
- [20] 申端峰. 农村研究的区域转向: 从社区到区域. 社会科学辑刊, 2006(1)
- [21] 申端峰. 迈向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农村区域比较研究: 第三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综述. 学术界, 2005(6)
- [22] 谭同学. 类型比较视野下的深度个案与中国经验表述. 开放时代, 2009(8)
- [23] 麦克·布洛维. 公共社会学. 沈原,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02
- [24] 吴毅. 何以个案、为何叙述. 探索与争鸣, 2007(4): 22 - 25
- [25] 贺雪峰. 城乡二元: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合理性. 上海城市管理, 2011(1)
- [26] 楚德江. 城乡二元结构值得留恋吗——与贺雪峰先生商榷. 学术界, 2012(9)
- [27]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22
- [28] 卢晖临. 社区研究: 源起、问题、与新生. 开放时代, 2005(4): 27 - 28
- [29] 王宁.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 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 社会学研究, 2002(5): 123 - 124
- [30] 曾群. 也谈个案研究的代表性或概化力问题: 兼与王宁教授商榷//陈向明, 主编. 质性研究: 反思与评论.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39 - 40
- [31]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陈强, 张永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The Transition from “Tangible” to “Intangible” ——A Reconsid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Research History

Liu Xiaofeng

Abstract The Chinese prominent community research is carrying out “through small place discern big society” approach, using “community” as specific carrier to discern the “society” or the “country”, and in hopes of understanding “intangible China” from “tangible village”. Studying community, transcending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research approach of transition from “tangible” to “intangible” is not only come from the inward heritage dynamic of academic field, but also on account of 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and patriotism. Chinese community research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intangible China” proceed from the exterior to the interior and from the part to the whole through three gradual procedures. By review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ty research, the article try to answer how does the academic pursuit of community research transition from tangible community to intangible country become possible, and why scholars now claim that could be achieved. Furthermore, consider whether the transition from “tangible” to “intangible” is the foreordination of scholar or the inner clarity of science.

Key words community research; methodology; tangible village; chinese society

(责任编辑: 陈世栋)